

見證者的散文詩學

——省籍作家葉榮鐘與洪炎秋散文研究

彭玉萍

摘要

本論文主要是探究葉榮鐘、洪炎秋兩位省籍散文家於戰後散文書寫的向度，故文本的擇定與取材依據主要依據兩位作家戰後出版的散文集與散見於各刊物平臺的作品。論述葉榮鐘戰後的文本包括：《半路出家集》（1965年）、《小屋大車集》（1967年）、《美國見聞錄》（1977年）、《三友集》（1979年）、《臺灣人物群像》（1985年），以及其餘散見於各雜誌二十餘篇散文，目前皆已收錄於葉榮鐘全集之中。而洪炎秋散文出版甚多，筆者論文其戰後的文本包括：《閑人閑話》（1948年）、《雲遊雜記》（1959年）、《廢人廢話》（1964年）、《又來廢話》（1966）、《教育老兵談教育》（1968年）、《忙人閑話》（1968年）、《淺人淺言》（1971年）、《閑話閑話》（1973年）、《常人常談》（1974年）、《老人老話》（1977年）、《語文雜談》（國語日報，1978年），其餘散見於國語日報社出版的九集《茶話》，以及筆者自行蒐集散見於各雜誌的篇章。

希望藉由作家葉榮鐘、洪炎秋為出發點，重新梳理本土散文的詮釋框架、文學影響傳統、美學實踐等議題，乃至於形成一套本土散文系譜的框架，藉以省視本土散文之於散文史、乃至於臺灣文學史脈絡的缺角現象。重要的是：反省臺灣文學逐日豐富多元的討論下，散文美學背後所呈現的美學與時代／世代、政治／現實不可避免的微妙關係，以彌補散文史研究與閱讀品味的匱缺，以及本土散文的文學意義長期受到忽略的狀況。而需注意的是，省籍作家所書寫的「本土散文」，其位置與指涉的對話組乃是有「非本土散文」，如抒情美文、學者散文與雜文，相對於當時流亡至臺的外省作家散文傳統。

然而，戰後臺灣文學場域受到主導文化與國家文藝體制的影響，抒情美文與學者散文成為散文文類的典律，而具雜文特質的本土散文之於美文與學者散文，具有強烈區隔性與異質性，並未在接受史與美學典律上受到青睞，此一暴露的問題，不僅是文學場域的競逐關係，更是關於臺灣歷史經驗的斷裂。回歸省籍散文作家透過書寫，將自身與讀者同步滯留於日治時期的殖民經驗、文化運動建構臺灣主體性的

過程，以及那些經歷認同混亂又懷抱祖國意識的世代經驗。以書寫之筆，證明失落的歷史與自我過去的理想迸發，並且為來者保留「事件」的刻痕與紀錄，使來者能夠繼續思索「往昔」，辯證「未來」。而值得考量的是這樣書寫行為都是指向戰後臺灣對於日治歷史經驗的匱缺感，以及作家所關懷的臺灣主體建構性問題。

是故，處理本土散文的議題與論述，不光只停留在文本本身，而應該思考作家自身經驗、世代遭逢、生命困境與書寫之間循環互饋的關係。本論文企圖重塑葉榮鐘、洪炎秋為首的本土散文路線，其內部的美學風格與文化想像、乃至於外部與特定社會文化環境的互動過程，檢視以本土散文的書寫文類，如何梳理臺灣的歷史葛藤與文學傳統賡續等議題，企圖重新省思文學活動的性質及其作家自身、和他人和社會存有的種種對話關係。

第一章 緒論：失身／聲的本土散文系譜

一、文化與身分認同的錯位與疊置

臺灣人身上常存有臺灣與日本的經驗並置，以及背負著「臺灣心中國情」的糾葛，這些都是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中建立起來的，抑或是其殘留的脈搏，但戰後經過二二八事件的屠殺與鎮壓，阻斷了臺灣人建立自我主體性的可能。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雖然反抗的是軍國主義，但卻能冷靜審視日本的近代化與文化底蘊。然而，在光復之後，臺灣場域所在場的卻是經國民黨政府所推行的「民主化」與「祖國化」。「民主化」實則是獨裁下的偽裝，一則以民主自由爭取美國的統一戰線，二則以民主自由區隔極權暴虐的中共政權；而「祖國化」則意味「中國化」，「中國性」透過國家策略性論述被重新建構與演譯，對內被用來將臺灣連結為以中國為一整體，興亡與共的民族國家，對外意圖成為捍衛與保有中國歷史傳統的隱喻，成為一幅利用文化獨特性與抵抗帝國主義的自由國家圖像。

臺灣在地文化與特殊日本殖民的歷史脈絡，被選擇性嫁接、收攏進入國民黨於中國大陸的抗日史中。然而，臺灣抗日史之於臺灣知識份子的意義，乃是具有反抗殖民所剝奪的權益，意圖爭取民主與發聲空間的積極性意義。戰後初期的臺灣史面對「挫敗者」國民黨撤退來臺，而臺灣人形成自我主體性與去殖民目標的挫敗，因為二二八事件與國民統合方針的落差，使得臺灣知識份子被削去任何發言權。當時的記者留下〈看今日臺灣——到處是可怕的緘默〉新聞稿：

事變剛好過去，各縣市議會——幾乎無一例外，接著就是致敬，就是挽留，姑不論由衷與否，這是還有強烈的諷刺的。自然與政府接近，必然唯有資格人士，於是資格人士口中以搜求民隱，無疑地一切只有兩字「安定」。

不過在我們的觀感中，臺灣的安定是幾乎近於沙漠般寂寞，是瀰漫著可怕的沉靜！……日本人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臺灣人就是這樣緘默過的。然而這並不是沒有話說，心裡明白，話在心裡說罷了。不過，幾個外省人的專有頭銜，如「阿山」等，公開已經不聽見叫出來，看不起「中國人」也沒有表面化；而「有識人士」在氣壓之中，提出了一個「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中的「有識人士」，於臺灣廣大群眾中的實際估計如何，我們無從而知。不過這一運動被人曲解為「新皇民化運動」卻是事實，「新皇民化」的字眼，也許不倫不類。但自臺胞口中說出，心裡事不無幾分透露。當然我們也不必自壞處著想，就是臺灣人也不個個再以殖民地自居。於今日之安定，對照昔日之安定，會感想，會回味，固然是人情之常，不過回味只在好處，不再壞處，只想甜頭，不想苦頭。¹（底線為筆者自行加註）

由此段話中，可以得知臺灣人當時所反映的「安定」，實則表述的是被動盪時局所噤聲的寂靜不語，對比昔日日本殖民經驗，沸騰的血被強制澆熄；「新文化運動」被譏為「新皇民運動」，實則有中國殖民臺灣的彼我、對立姿態。由二二八事件前的臺灣人被奴化的論述，到二二八事件前臺灣民眾的「親日」形象，不只意味者表面的衝突，更隱含著之於國民黨政府欲以臺灣殖民經驗，連結抗日與中國認同的策略性政治的巨大倒轉。這樣的連結策略與呼應策略，強制收攏臺灣的殖民經驗為中國抗日史的謊言，反而成為臺灣人精神圖像裡的殖民經驗再現，昔日日本殖民經驗重新再現與修復，成為懷疑、思量中國認同的強力對照物。這樣一種急需被清理的曲折精神史，卻弔詭地因為國民黨政府的權力政治而浮現，然而，這群臺灣人共有的日本殖民經驗之於中國圖像／祖國懷想的拉扯，卻無法被立即性地獲得安撫、重寫，究終這樣的「懸宕」只能成為一種困惑，其中的原因有的是源自於現實環境的高壓，有的是源於臺灣人／作家必須先安視於眼前生活。

但值得注意的是，戰後的本土書寫無不在體現這樣雙重圖像的糾葛，且日本殖民經驗、日本留學經驗並未如同反共體制的策略性政策下被覆寫，反而成為一抹暗影殘留於作家書寫之下。這樣的日本經驗的再現，其意義並非只是「再現」的意味，更有著「轉折」的位置，殖民經驗同樣也被臺灣人選擇性擷取為用日本（好的一面）作對照，「對比」國民黨統治，抑或標示自身為「臺灣人」的特殊經驗。雖然臺灣人在戰後追尋主體性的狀況是挫敗者的姿態，但是這樣主體性視野與追尋並未褪去，在這模糊難辨的殖民權力體制下（日本／國民黨）如何安置、梳理、重構，是他們最大的命題。戰後省籍與外省人兩方的同為「挫敗者」的形象，在對立的視角下兩方看到的也是「日本」的共同幻影，無論是過去極力醜化

¹ 顏澤，〈看今日臺灣：到處是可怕的緘默〉，《民權通訊社》（甲種稿）52（1947），頁305-307。筆者轉引自何義麟，〈光復初期臺灣知識分子的日本觀〉，收錄於黃俊傑編，《光復初期的臺灣思想與文化轉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2），頁200。

的侵略者形象，或者目前被過度美化以安頓自身的日本殖民記憶，都是不正確的日本觀。²

徐復觀在香港所辦的雜誌《民主評論》刊出的文章，時間是一九六二年莊遂性去世不久的悼念文，同期刊有徐復觀〈一個偉大地中國地臺灣人之死——悼念莊垂勝先生〉³、葉榮鐘〈臺灣的文化戰士——莊遂性〉⁴，簡言之，看標題就可以想見兩人對於莊遂性的定位了。有意思的是，徐復觀如此紀錄莊遂性所說得話：

我們在日治時期，唱平劇，結詩社，寫毛筆字，做一兩件長袍之類的；不僅借以存故國之思，並且大家不言而喻地，表現這才是我們的本來面目。日人對此亦無可奈何。及他們戰事失利，對我們的疑慮日深，壓迫日甚，大家只好暫時收斂一下，把做的中裝放在箱子裡面，不敢穿；對中國文化，也盡量在口頭上少談。等到日本投降，大家不約而同的心花怒放，以為平日積壓在心裏，書櫃裡，衣箱裡的故國衣冠文物，現在才算出了頭，大家可以稱心地發抒了。哪裡知道政府大員來臺後，有形無形地告訴我們，所謂中國歷史文化，乃至其中的文物衣冠，早經落伍。今日我們的成就和努力的方向是現代化。不取消這些落伍的東西，便不能現代化。我們想為什麼現代化和中國文化不能並存呢？假使所要的只是現代化，則在我們心目中，日本人究竟比祖國的某些先生高明多了。想起來更令人沮喪的是：日本人要我們忘記中國的文化，內心裡認為中國文化對我們是有價值的。而我們祖國的先生們，希望我們忘記中國文化，公開地認為中國文化對我們是沒有價值的。

他(按:指莊遂性)中間曾一度和我說到，他願以過去為創辦中央書局而到各地講演的方式，展開一個中國文化的運動。但我覺得時移世易，容易引起誤會，不很贊成。他又想由我主持編一套真正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精神，可資一般人教養之用的叢書，由中央書局出版。……正因為他對祖國文化，有這樣的信念，所以他對現實雖有若干不滿，但這是一個偉大地中國地臺灣人的不滿，這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所不能不有的不滿。這不滿之中，自然有感情與理智的節制。⁵ (底線為筆者自行加註)

² 何義麟，〈光復初期臺灣知識分子的日本觀〉，收錄於黃俊傑編，《光復初期的臺灣思想與文化轉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2)，頁 205。

³ 徐復觀，〈一個偉大地中國地臺灣人之死——悼念莊垂勝先生〉，《民主評論》13:24(1962.12.20)。後收錄於氏著，《徐復觀雜文 4 憶往事》(臺北：時報文化，1982.11)。

⁴ 葉榮鐘，〈臺灣的文化戰士——莊遂性〉，《民主評論》13:24(1962.12.20)。後收錄於氏著，葉芸芸主編，《葉榮鐘全集 2 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2000.8)

⁵ 徐復觀，〈一個偉大地中國地臺灣人之死——悼念莊垂勝先生〉，《徐復觀雜文 4 憶往事》(臺北：時報文化，1982.11)，頁 146-147。

這一段長話引述，很坦白表露出莊遂性所代表著那一輩日本世代，所背負的「臺灣心中國情」的身分黏貼。因著「中國文化」的想像而與避居臺中的外省籍學者徐復觀、涂壽眉、孫克寬、陳兼善等人成為知己，以臺中中央書局為中心，所串聯起的日治經驗文化人交遊網絡。這一脈網絡所拓及的不僅是如前述莊遂性等右翼作家，尚包含日治時期左翼的作家，諸如王詩琅與楊逵等人，而此共有的價值觀與日治經驗，成為串聯網絡的重要質素。筆者所研究的葉榮鐘（1900-1978）與洪炎秋（1899-1980）同樣也是當中的一員，之於作家筆下的人物夾纏在中國—臺灣—日本，透過殖民者／外來者在「臺灣」的來去出入，「臺灣」實際的地域空間並未移動，卻因為無法抵擋的政治因素，而逼使「臺灣」的人民、歷史、情感經由不斷殖民者出入，產生變相的「跨境」作用。這樣的「跨境」作用意指的是「臺灣」的缺席，在場的是「日本」與「中國」經驗，且臺灣變相成為「日本」與「中國」的「模範」，具有比殖民者國內更權威、鮮明的「日本」與「中國」圖景在臺灣衍生，而這種狀態對於時駐留在臺灣的住民既是「空間」，也是「時間」的花果飄零。

戰後省籍作家聚集的《臺灣文藝》，初期刊物上明顯看到不同世代的文學展現，有吳濁流以日治為背景的小說，也有葉榮鐘針對戰前有關蔡惠如、梁啟超、矢內原忠雄等人的回憶記述，在漢詩一欄中偶而可見陳逢源、吳濁流、葉榮鐘、楊雲萍、黃得時、周定山、莊幼岳的作品，前一世代文學者的出現，不無作為臺灣文學傳統在象徵意義上的一種提醒。然而，省籍作家發表作品的平臺少之又少，除了殖民性格與奴化的負面標籤，日治文學傳統在戰後也因語言隔閡、冷戰反共，而得不到正面評價，當六〇年代現代主義與新批評大行其道之時，語言形式與技巧被視為創作的靈魂，以文本的內緣式詮釋為取向的做法更加使得日治文學毫無研究與回顧的價值。且至解嚴後，這些日治時期走來的世代被當作「抗日英雄」所表述，依舊無法回歸實體的真實自我；乃至最近的臺灣文學走向體制化，這段歷史卻仍然無法被正面對待。葉榮鐘與洪炎秋被直接與間接地賦予「見證者」的位置，他們透過文學／史學嘗試著接近命名、賦形、重構、安頓這群與之同世代的每個人孤獨的、蒼白的靈魂與身軀，透過使命再現於書寫之中，傳達一種對世代、乃至於靈魂的敬意。

二、「政治機器」與「市場機制」下戰後散文史的罅隙

臺灣戰後威權體制下，由國家機器壟罩下的文藝體制，在體制性與結構性權力關係下的個人活動，固然亦具有某種個人自主性，但無疑將受到時代語境下眾多因素的牽制與羈絆，這在國家意志至上與時代氛圍驅使的五〇、六〇年代，乃至於尚未解嚴的七〇年代的臺灣文學場域尤然。在當時臺灣場域「凍結的時間」與「虛擬的空間」的異態時空環境下，反共與冷戰的局勢無非是考量當時文藝體制與文壇走向的重要外緣因素。當然，彼時的流亡作家與後殖民作家，面對國家

文藝體制，仍有其具有差異性的肆應之道。

王鈺婷對於五〇年代女性美文作家的書寫策略與風格醞釀的議題，有精彩的論述，論者主要觀察發現：抒情美文的風格透過特定體系的操作，佔有文學場域一定地位，其抒情傳統體系的構築隱含政治動機⁶。而反向思考另一支散文類型，學者菁英式的小品文，現實議題的羸弱，侷困在人生哲理的索求，透過學院的崇高地位與親美的文化資本，與抒情美文同為「偽自由主義」的代表⁷。這一作家書寫風格與生存姿態，應與當時歷史語境進行並置，回顧張誦聖點明戰後「主導文化」對文藝品味的引導，以及戰後國民黨政府形塑的大中國化身、保守的、尊崇傳統的教化性「主導文化」，其發展出來的文學重要屬性有：經過轉化的中國傳統審美價值、保守自限的世故妥協心態、受都市新興媒體影響的中產品味⁸。這一點觀察可理解抒情美文、學者散文與「主導文化」的微妙狀態，同樣的，省籍作家對於這一「主導文化」的支配也無法置身其外。當然，省籍作家的文學品味及其傳統，並非以放棄對於知識份子介入現實關懷的權力作為代價，然而，其「反抗」的姿態卻儼然需要另一番的掩藏與暗渡陳倉。

省籍散文家葉榮鐘六〇年代末期因應退休的餘裕，開始書寫並且刊行一定數量的散文，散文的刊出也可謂是他為了維持生活而寫，同時也有一定程度的對社會現實的否定思想。葉榮鐘散文的發表平臺異常的破碎，而「破碎」也正顯示著省籍作家再出發之不易，其發表平臺遍佈本省與外省、親官方與民間雜誌與報紙。而透過葉榮鐘與雜誌報刊編輯的信件往返，更可以間接理解臺灣當時文壇，乃至於美學品味的問題。例如：王鼎鈞擔任《徵信新聞》編輯一職，但退稿的比例有一定程度仍服膺於整個「主導文化」的趨向，諸如王鼎鈞任該報副刊編輯時，退過葉榮鐘〈釋大租權〉⁹、〈日據時代臺灣的日本警察〉、〈新聞廣告的效用〉¹⁰等稿件，分別以過於學術、正值多事之秋之敏感議題，應小心、礙於同業攻訐為由拒絕刊登。對比之前王鼎鈞極力向葉榮鐘邀稿，希望形塑《徵信新聞》「人間」副刊為幽默、同情、善意風格的文章天地¹¹，縱然與副刊走向有關，當時對於臺

⁶ 相關論述可參酌王鈺婷，〈抒情之承繼，傳統之演繹——五〇年代女性散文家美學風格及其策略運用〉（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2）。

⁷ 關於男性學者散文的研究與檢討，可參考陳建忠，〈冷戰與戒嚴體制下的美學品味：論吳魯芹散文及其典律化問題〉，「媒介現代：冷戰中的臺港文藝」學術工作坊（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2012.6.29-30）。

⁸ 相關論述請參酌張誦聖，〈臺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6），頁 120-125。

⁹ 〈釋大租權〉的退稿理由，詳見王鼎鈞致葉榮鐘書信，（1965.7.7），源自：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之建置網頁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89/96.html>。

¹⁰ 〈日據時代臺灣的日本警察〉、〈新聞廣告的效用〉的退稿理由，詳見王鼎鈞致葉榮鐘書信，（1965.12.7），源自：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之建置網頁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89/98.html>。

¹¹ 相關談話詳見王鼎鈞致葉榮鐘書信，（1965.4.28），源自：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之建置網頁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89/93.html>

灣風物的理解仍侷限於通俗且輕鬆的取向。

臺灣「鄉土」是被收攏於所謂的通俗與柔美的美學價值觀之下，本土散文被大眾閱讀與期待的品味也有異於女性美文形塑下溫柔敦厚的懷鄉書寫，這也反映出戰後文學場域存有侷限性的書寫與美學偏味的狀態。

而同樣葉榮鐘處於「民間」的發表狀態尚受桎梏，更遑論位居「廟堂」的洪炎秋，雖同為國語日報社長與立委，但非國民黨籍與文人為政的姿態一直是整個國家體制的「外者」。故在重新評價與定位本土散文之於戰後的走向，無法脫離國家文藝體制與主導文化，且本土散文某種程度對於美文與學者散文而言，具有強烈區隔性，這是定位這一類型的散文品味與書寫群體必須考量的部分。

三、本論文研究企圖

在戰後的臺灣散文史，抒情美文與學者散文成為散文文類的典律，本土散文並非在既有的文學史框架之中，目前論述五〇年代的反共文學、六〇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但本土散文與這兩股勢力不太具有關係，一方面是因為反共所標舉的乃是正統大中國的圖騰，二方面乃是現代主義的迂迴無根的狀態，與本土散文的「文學反映人生」中心思想產生悖反。也就是說，目前文學史傾向的一種進化式史觀下的軸線，並非能夠容納本土散文的思考，也無法對散文的論述進行合理的定位，且文學史目前著重在小說史的論述，在散文文類的論述也主要偏重外省籍作家的作家作品論，以致於導致七〇年出版的官方文學史、乃至於百年時間點論述的文學史，都呈現本土散文與省籍作家的「缺史」、「缺角」的狀態。

「本土散文」界定，筆者認為區隔學者散文與美文，跨越時代的省籍作家，對於日治經驗葛藤與中國文化想像的梳理與安置，也就是日本世代的戰後精神史問題。當初用本土散文的命名，主要有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如此用，但筆者更想將它系譜化與定位，成為散文史匱缺的補充。我主要指涉的是葉榮鐘與洪炎秋五〇年代開始的散文書寫，延續至六、七〇年代。

當然，五〇年代並沒有所謂的「本土」一詞，筆者有其權宜性的論述，他們的書寫範疇與書寫關懷根源於台灣鄉土，而命名為「本土散文」，之所以不用「鄉土散文」的原因是因為，書寫鄉土只是散文的一個寫作類型，而且美文和學者散文也寫作鄉土，不過是懷舊鄉土，寫中國的鄉土，所以命名為鄉土文學，指涉力道很薄弱，因為筆者要強調日治世代的散文關心台灣、寫台灣、寫台灣身處於中國與日本的殖民史中傷痕與經驗饋缺等問題。也可以說，「本土散文」命名是對於書寫內涵的區隔，當中包括生命史、文學影響傳統的區隔，以及內部的書寫特質的區隔，也就是並非是表面的寫作內容的區隔。當然本土散文也寫鄉土、也寫

抒情美文、也有學者，但正因為這樣的身世和影響傳統，所以迥異於其他類支派的散文。或許，抒情、美典、小品，可以做為文人免於迫害的技藝，一種隱微表述，迂迴預設了假面與偽裝，但它也可能淪為假面，它不必然是一種抵抗的策略，也可能讓作家透過表述的權力，遁入類型化的偽裝，進入美典的超越歷史空間。於是，文學無干乎歷史，作為表述的策略空間，也成為作家精神逃逸的空間，以超越之名。這樣的書寫內涵與書寫美學背後的精神高度，我們是可以釐清、給予中肯的評價的，對於本土散文對於現實積極的書寫驅力，透過意在言外、文明批評、諧謔嘲諷的手法，表達他的沉默與空白，文字與文字間的焊接處，潛伏在文字深沉的愛與死是甚麼？而本論文所論述的見證者散文，是本土散文中重要的一支書寫類型，也是最足以代表本土散文的一類。

筆者所企圖架構的「本土散文」系譜，意味著跨越日治到戰後的本省籍作家群，透過散文文類為書寫載體，具體呈現出對於「跨越」時代所衍生的生命質變、理想衝擊、書寫關懷等議題。透過散文與生命史之交織與互攝，對於日治葛藤的梳理、以及對戰後世代與社會的接軌等問題，文類與自我的雙重指涉與交混，是筆者認為「本土散文」之於其他散文類型，最具區隔性與特殊性之處。故，此一散文類型是佔居學術「邊緣」之趨，筆者擬欲以此為關懷核心，透過此一散文類型的梳理與賦形，關照跨時代作家這一群體與歷史的互動性。其中，跨時代的省籍作家以散文類型書寫為最凸出特色，也能成就一家之言的，筆者擬定挑選葉榮鐘與洪炎秋兩人做為並舉，兩人不僅同為鹿港出身的作家，出生年前後相差一年，同為帝國殖民而有跨國移動行為，而兩人的文學歷程更有相互對話的過程，這樣的對話，不僅是文學，也在歷史，或者說在於它們動人的交叉與互動。歷史也好，文學也好，在實存的世界中它們未嘗有所分割，都是擁有跨時、跨國、跨語的重層想像的作家所竭力的。

為檢視本土散文在戰後的文學生產過程不受重視的狀態，本文將針對葉榮鐘、洪炎秋為例的本土散文，進行外緣與內緣的研究。為了要追索這些問題，筆者的觀察範圍除了賡續以往關於作者研究、書寫文本的分析，亦需理解並詮釋這些作者、文本是在什麼樣的歷史結構、社會情境、心理狀態底下所生長出來？其內蘊或外露的認同政治、歷史記憶、再現敘事等等面向，也須被擺置在戰後以來省籍散文家所處特殊社會空間、創作空間、國際冷戰框架、國家政策的規約下進行思考。方能體現本土散文共有的價值關懷與書寫核心的內在肌理、外在形式的諸多變體的互攝的對話。藉以回應本土散文書寫的歷史意識，乃是牽引著日治經驗世代與現有體制所屏蔽的臺灣經驗。

筆者企圖由單一的作家論研究，透過葉榮鐘、洪炎秋的影響傳統與書寫向度的梳理，連結整個日治經驗世代跨越到戰後的精神圖像與身體時間的過程，乃至於回應到葉榮鐘、洪炎秋本土散文創作的美學品味與散文史觀缺角的議題。且葉

榮鐘與洪炎秋乃摯交，彼此的文學觀、乃至於文化資本私下如何進行匯流與補充？無疑的，筆者形塑兩位作家的形象，並非透過比較式的平行式閱讀，乃是將兩位作家併置，透過他們的書寫共同輻射出某些共通的議題。而兩位作家的異質性也並非與筆者企圖論述的議題有所背悖，故此一歧異的流動經驗與文學影響傳統，如何最後呈現出共同的書寫內涵？此亦是筆者透過梳理兩位作家的異質性，所企圖釐清的部分。

是故，處理本土散文的議題與論述，不光只停留在文本本身，而應該思考作家自身經驗、世代遭逢、生命困境與書寫之間循環互饋的關係。本論文企圖重塑葉榮鐘、洪炎秋為首的本土散文路線，其內部的美學風格與文化想像、乃至於外部與特定社會文化環境的互動過程，檢視以本土散文的書寫文類，如何梳理臺灣的歷史葛藤與文學傳統賡續等議題，企圖重新省思文學活動的性質及其作家自身、和他人和社會存有的種種對話關係。

第二章 戰前五四論述與日治傳統：論葉榮鐘、洪炎秋本土散文創作的書寫政治

回溯臺灣文學中的「抗議」精神時，無可忽視的是戰後跨越日治時期的本土作家這一支脈絡，筆者擬欲重新架構出戰後臺灣散文史的另一支散文系譜，命名為「本土散文」。其指涉的作家群是跨越日治時期的省籍作家，此一系譜有別於戰後臺灣文學場域中的學者散文、女性美文與專欄雜文等三支散文書寫類型，其書寫關懷著力於對時代與政治，乃至官方論述的顛覆與批判。

行文至此，筆者想追續前一章節的發問，首先以葉榮鐘、洪炎秋此支本土散文書寫脈絡，所涉及作家文學影響傳統為何？究此問題，試圖溯及戰前作家身世與時代語境的詰問與對話關係。再者，這樣的文學影響傳統之下的美學實踐，如何呈顯在戰前、乃至於戰後的書寫內涵？無疑的，兩位作家共同展演著一種「見證者」生存姿態與書寫策略，其身世與散文美學之間，有值得梳理的遺緒與意在言外的幽微處，這不僅是葉榮鐘與洪炎秋散文美學的問題，更是整個跨越時代的省籍作家世代所負荷的身世葛藤。

根據本章的討論與梳理，我們可以思考到：在強調臺灣文學中「抗議」的精神時，無可忽視的是戰後跨越日治時期的本土作家這一支敘事脈絡，背後透視著其對時代與政治，乃至官方論述的顛覆與批判。筆者形塑葉榮鐘與洪炎秋作家的形象，透過將兩位作家併置，梳理兩人的書寫共同輻射出某些共通的議題。葉榮鐘與洪炎秋的身世與美學實踐扣連，共同輻射出「見證者」的本土散文路線。

作家透過書寫關懷，顯然有意於反共神話下的抒情美文與學者散文路線，他

們依舊扮演著日治時期諫言的公眾知識份子形象，意圖戳破反共／自由民主的偽裝。論者陳芳明指出：「自由主義運動自始自終都停留在爭取發言權的政治面，而聶華苓則把這種爭取發言權的努力與文學創作結合起來，從而在人文方面拓展了遼闊的版圖。」¹²這樣子抽離當時《自由中國》雜誌脈絡的意見，回歸雜誌的梳理可以發現此平臺呈現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雜誌文藝欄與社論欄呈現雙向悖反的聲音，當評論欄疾呼：「談『反共復國』而不談自由民主，是死路一條；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反共復國』的活路。我們誠懇希望從新內閣開始，快由『死路』上回過頭來走向『活路』」¹³、「近若干年來，某些當權者更且仇視五四思想，製造五四罪狀。他們竟至將丟掉大陸的責任推卸於五四運動。這真是顛倒是非的天大的栽贓手法。……因此我們要大聲疾呼的呼籲國人：『重整五四精神！』」¹⁴而與此同時的文藝欄所刊載的是易希陶、思果、徐鍾珮等等充滿閒適與羈旅的散文風格。再者，聶華苓等副刊編輯之下透視著當時文學場域一股人力重疊的現象，文壇、出版社、政壇的互通有無與相互關涉，當以外省文人為操持的文學場域，他們發「言」的位置、發「言」的內容、發「言」的都值得我們更加斟酌熟慮。¹⁵此一批散文，在當時游移於諸多發表平臺，直接與間接地趨合官方文藝政策。

而與此悖反的是，戰後葉榮鐘與洪炎秋，被去除發言慾望與能見度的他們，卻又不願意放棄發言的姿態，在書寫的精神狀態上都有某種程度的壓抑與分裂，常在自覺與嘲弄「無用」的狀況下，仍不停的「訴說」，以文字或語言表達自己的意見或立場，政治姿態依舊鮮明，這是葉榮鐘與洪炎秋的散文共同輻射出來的力道。然而，葉榮鐘日治時期的民族運動與洪炎秋北大教養的經驗，又輻射出其各自戰後的美學實踐與文學位置的殊異。葉榮鐘的民族運動志業，在戰後儼然被掃入歷史餘燼之中，此一庶民的位置以著文明批評、諧謔諷刺的書寫策略，對於社會現實提出「問題」。而洪炎秋既官方又庶民的位置，有著相較於葉榮鐘更為順遂的發表平臺，而其中的關鍵因素乃是「半山」身分，而此「半山」身分更混雜著鹿港「遺民」的家學系譜。故洪炎秋得以取得諸多外省籍、半山友人的資源，而更能與臺中中央書局等民族運動經驗的友人有深厚的交誼，是故，洪炎秋戰後數十年的立委任職即是兩者護持下的結果，進行考量洪炎秋的身分認同、美學實踐、文化資本是極為重要的兩股因素。

然而，透過梳理洪炎秋「廢人」、葉榮鐘「半路出家者」的頹廢與無用的姿態，其中藏有著作家刻意經營的生存姿態，其生存姿態的背後透視著戰後大中國

¹²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上）》（臺北：聯經，2011.10），頁324。

¹³ 該論述出自於〈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19:2（1958.7），頁32。該期為紀念戊戌政變，紀念康有為、梁啟超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知識份子精神，並特稿胡適發表〈梁任公先生年譜常編初稿序〉，用以表示對梁啟超的推崇。

¹⁴ 該論述出自於〈給讀者的報告〉，《自由中國》16:9（1957.5），頁32。該期為五四運動紀念號，該刊特邀梁實秋與夏濟安，同期有〈社論——重整五四精神〉、梁實秋〈五四與「文藝」〉、夏濟安〈對於新詩的一點意見〉。

圖像的社會背影和歷史創傷。作家藉由這樣逆寫的生存姿態「突圍」被隱匿與消音的困境，理解此省籍作家經歷日治／日本／中國經驗交織的移動身體與身世經驗之間，作家不變的文學之心、作家之眼。而作家個人、行動、文本之間所透視著雜種／兼容的文學影響傳統，仍舊標誌著為臺灣的文學場域與闕裂的歷史經驗進行修補的過程。無論在日治或者戰後，每個歷史的轉折點，社會的轉變期，都能看到這些被迫扭曲與不肯輕易放棄的心靈。而作家所思所戮力的，皆是在肉身與記憶消逝前，留存下他們曾經踏過、見證過的足跡。

第三章 懷／還人：以寫人散文抵禦正統歷史的書寫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文學系譜之中，經營寫人散文的傳統其來有自，有賴和、吳新榮、王詩琅、郭秋生等人，對於人物典型的形塑，都帶有一種「寫真」的寫作手法。不僅是人物圖像特徵、行為、理想的掌握外，更重要的是作家都將這些人物與他自身、時代賦予某種關聯，從而體現出一種殖民地脈絡下的人物圖像。當中既帶有作家個人知性抒情的特質，亦兼有時代感與哲思的散文風格。這種寫人散文的傳統至日治以降，展演在葉榮鐘與洪炎秋的书寫類型之中，其中葉榮鐘更精細地將寫人散文當作「群像」的蒐羅與經營；而洪炎秋の旅平經驗，更為此寫人散文帶來地域性的不同對象與內容。

下述，筆者透過戰後實際的社會現實語境的梳理，連結至兩位作家寫人散文類型中，以「五四名士」、「忠義之士」、「曖昧定位型的人物」為主要書寫對象的寫人散文，探究作家如何透過「懷人」書寫而「還人」的過程，返還屬於臺灣真正的歷史、真正的「人」的主體與價值、原本的心靈「創造物」、文學創作與生命經驗。也透過此一寫人散文的類型書寫，藉以回應戰前臺灣文學傳統，存有問題散文與閒適小品文兩支散文路線，在戰後臺灣文學場域的延續狀況。

筆者透過戰後實際的社會現實語境的梳理，連結至兩位作家寫人散文類型中，以「五四名士」、「忠義之士」、「曖昧定位型的人物」為主要書寫對象的寫人散文，探究作家如何透過「懷人」書寫而「還人」的過程，返還屬於臺灣真正的歷史、真正的「人」的主體與價值、原本的心靈「創造物」、文學創作與生命經驗。也透過此一寫人散文的類型書寫，藉以回應戰前臺灣文學傳統，存有問題散文與閒適小品文兩支散文路線，在戰後臺灣文學場域的延續狀況。這場由「寫人」、「懷人」抵達「還人」的過程，之於葉榮鐘與洪炎秋而言，其「見證」的使命完成，不僅隱含「人的倫理學」的回歸，尚包含著在這見證的過程中，對於作家、土地、臺灣歷史的療癒行為。因為書寫所以存在，同時也正因為透過書寫，所以同時對於政治迫害與政治抗暴的「書寫倫理」的重新掌握，深鑄在「見證」的形式中。

第四章 棲居在鄉土：論葉榮鐘與洪炎秋小我散文的主題書寫

承繼上章節論述的由「懷人」至「還人」的書寫政治，必須將作家的文學影響傳統與身世背景考量進去，這樣的「根本」所發散出來的文學實踐與美學關懷，就呈顯出對於「人」與「歷史」的文學倫理學考量。筆者並不在於意圖強調葉榮鐘與洪炎秋的創作意圖，是透過精密計算與強烈意識下的產物，反而在當中凸顯出其本土書寫的系譜，如何透過這樣的軟性書寫或隱或顯傳遞著不被理解、被遺忘的焦慮與渴望。對比於服膺／符合官方論述下的美文與學者散文書寫內容，象徵著菁英、學究、涵養的溫柔敦厚，具有強烈的區隔與標誌性。

此章，筆者將循序這樣的軸線，透過「小我」為出發，觀看葉榮鐘與洪炎秋如何透過書寫「生活」、「自我」、「土地」，如何表述與重建當時擁有話語權的「主流群體」所隱蔽的心靈、精神伏流、乃至於所掩蓋的「次級群體」的刻痕？這些主題的書寫，所涉及的不僅是作家個人、乃之於當時的社會現實，與有待清理的日治歷史葛藤。且必須值得注意的是，本土散文家在層層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網絡之下，其表述話語與言外之意，兩者之間的交相指涉，因為那是他們被刻意湮滅的心靈伏流與沉澱物，作家在此其中，傳遞出對臺灣、土地、人的價值的最終追求與思考。

必須值得論述的是，葉榮鐘與洪炎秋的小我散文當中折射出的美學觀，無論是今昔對比造成的文本張力，或者是藉由正話反說、反話正說等諷刺諧謔的手法，他們都擅長形塑一種「典型」，不管是正面人物或負面圖像，作家將其置於時代、社會歷史的更大時空下進行剖析與發掘，以一種非凡的穿透力，竭力排除其個別性具體性特殊性，快刀斬亂麻直截切入問題本質，做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整體概括，這些問題並非個人的、單一的，而是整個社會相、共相。此一無數的群像「寫真」，當中存有的無法被時代巨輪碾碎的東西，可能是人的價值觀、鄉土愛。

第五章 鏡子與地圖：論葉榮鐘與洪炎秋遊記散文的異國見聞與實踐辯證

第五章對比戰後冷戰時空，葉榮鐘與洪炎秋各自於七〇年代與五〇年代的出國經驗，化為遊記，比對各自的旅行姿態、遊記文體與出版時空的殊異，對照私密日記與書信、友人的推薦信，可以發現這旅程被非出於作家個人私我的旅行，乃是背負著整個世代之眼與思考出發與寫作的。

此遊記對比於當下女性抒情美文與男性學者散文的遊記風格又有甚麼樣的對話？其內容如何透過與外視域交叉觀看的過程，回應於自身的時代與國際脈絡？絕對迥然於美文作家如徐鍾珮等人，那種挾帶著宣揚、交流、半官方的心理暗流，雖是以

女性為肇發點的書寫，確實則有意於服膺、謀合於官方的姿態。而重要的是，行經這一段看見自己的旅行之後，省籍散文家如何由不同時空的移動與身體的時間中，如何思索自身與臺灣歷史的進程。

透過葉榮鐘與洪炎秋的遊記，其內容並非漫遊式的介紹文章，具有內在的梳理，提出問題的筆端，乃回應於自身的時代與國際脈絡，由出發直至文字再現的當下皆是如此，有其感時憂國的一面／並非扮演「導遊者」的姿態。在國府大力鞏固的「國家論述」下，反共與美國是一體兩面的存在，因為這代表著國際上的正統性與經濟上的援助。故，親美、知美的外省作家，參觀美國、繼而討論美國已成為主流的文化想像，他們對於美國式的民主、人權制度，擔任一種代言、闡釋的位置，走向了美援文藝體制的壟罩之下，透過「仲介」美國文化到臺灣的過程，他們的寫作透視著純粹美學、資本主義現代化、中國文化現代化等路線。或者另一派女性抒情路線，扮演著「傳聲筒」的角色，實則其服膺於國府官方，宣傳反共等意涵，這樣子兩個脈絡下生產的遊記，無非是無關乎臺灣現實環境的。

透過前述對於葉榮鐘與洪炎秋對於寫人散文與小我層面散文的探討，我們仍舊可以在遊記這一文類的書寫中，發現作家糾結於國家論述下的「應該」寫什麼，與個人追索文學意義或是美學關懷的「願意」寫甚麼之間往來交鋒。因而揭示此一進程中自我的適應與協調，以及確定了「兩者都寫」的特定立場，循此而牽涉出的是五〇與七〇年代，葉榮鐘與洪炎秋此一本土散文路線下，遊記書寫的特殊性與凸顯性，循而牽涉出本土散文家在外部「文本」和美學關懷間的糾結拉距。

無疑地，兩人對於美國現代性之下的歷史、人權、文化、自由的觀照，回歸到臺灣現有的當時環境，透過遊記書寫「再現」於當時的文學場域，或者以著一種威廉斯的「殘餘文化積澱」（residual cultural formations）的概念，經由文字書寫、身體實踐予以承襲，這些「沉積物」並非是在旅行結束、作品出版後即禁絕消失，而是不斷地有所吸納、挪用於作家的生活體驗、書寫實踐之中。

第六章 結論、本土散文納入文學史：另一散文詩學的新起與意義

一、「見證者」的志與懷：戰後葉榮鐘、洪炎秋散文的美學藝術與價值

本論文透過以葉榮鐘、洪炎秋戰後散文書寫的向度為論述重點，以及扣連以葉、洪兩作家為例的本土散文書寫與臺灣文學、臺灣歷史的關係連結層面。從文學史中忽略帶過的片段與形象缺角的部分，重新拼湊與賦形本土散文之於臺灣的影響，及其文學影響傳統、美學實踐與精神圖像等部分。其背後乃透視著當時外在的政治與文壇等互動，乃至被忽略的日治經驗世代，這些都有待重新梳理本土散文之於臺灣文學史、散文史系譜應有的文學位置。由戰前五四傳統與臺灣日治經驗的兼容與賡續下，因為著這樣的身世與教養，所以葉榮鐘、洪炎秋的書寫關

懷始終異於戰後的小品文與美文的路線，意味著兩位作家的本土散文與外部環境的對話性及凸顯性，此乃本文開展的軸線與關懷核心由三個主要書寫主題：「寫人散文」、「小我散文」、「遊記散文」部分，作為本論文開展的主題。

筆者定位葉榮鐘與洪炎秋散文為「見證者」的書寫姿態，乃在於他們無論是透過寫人、小我、遊記的書寫主題，都是在進行著歷史事件的描繪，時而記述人物，或者雖旨在坦露「自我」，但仍不拘泥於以自我為主。顯然，可以看出作家刻意的「選擇性」書寫的結果，對於歷史事件更具有「再詮釋」、「再重寫」的企圖。透過葉榮鐘文學、史學的雙軌寫作，以史寓理，文明批評式的寫作；或者洪炎秋的諧謔諷刺風格的小品文寫作，都展現出他們透過歷史敘事，企圖給予缺乏經驗者一個解釋歷史的其他「可能性」，並且暗喻著作家的思想，以及被掩蓋的日治世代經驗，存有著更大的內在思索與關懷。可以說，對於葉榮鐘與洪炎秋，甚至是這群日治世代知識份子而言，「見證」的文學抵抗力來自於權力機制之下的刻意／不經意的遺忘天性，他們筆下的執拗性，賦予「過去」應有的意義，因為「過去」往往等於根本。

雅克布（Jakob Lothe）所說的：「見證是一種傳遞（交際）行為，該行為的見證往往採取敘事形式，而沒有說出來與另外一個人的證詞便不是證詞。」這段話指涉出兩層意涵，此一透過書寫進行見證的過程，「告訴他人」本身正如同證人在法庭上行「我在此，面對他人，說出來」的動作一般；同時也意味著自己不再迴避、遺忘或忽略曾經發生的事實，當行為主體透過訴說遭遇的過程，正也是在尋回自己。這種「見證」的雙重意涵，擺置在葉榮鐘與洪炎秋面對戰前身世史與戰後生活史的落差之時，他們的書寫心理、文學倫理學、乃至於書寫位置皆發生質變的過程，但此一不斷迴返、執意表述的「直拗性」卻始終貫穿於書寫表裏。其中，變與不變之中，他們對於「人」的價值、文學藝術、個人主義、民主自由、化解不合人性倫理的強權的理想，始終不曾改變。而書寫之中的「變」僅曾為文字表層的保護傘，巧妙的行使於戰後的語境，不相違背，卻又從中反思、質疑當代價值觀。「變」的是外在形式的轉換權宜，「不變」的是為社會而藝術、言己之志的過程。

透過散文寫作類型梳理與探究，筆者乃企圖在建構一套精神系譜，經由日治到戰後，潛伏於黨國體制之下的伏流，省籍作家在日治時期在殖民的狀態，面對異族殖民現代性的過程中，臺灣知識份子以文化抗日的過程中，逐一發展出一套「中國文化想像」、「臺灣意識」的特殊性之處，這樣的精神主體之下，隨著國民黨來臺，再一次經過翻轉，原本對比、區隔日本的精神主體卻成為「中華民國」的對造組。歷史的弔詭性，不斷作用於這批跨時代的省籍作家身上，戰後的書寫意義正是來是於，因為失落而書寫，但也正因為書寫所以更加證明其失落的現況，這已經演變成一種「情節」、「宿命」，而這正也是陳建忠挪用王育德之語，將戰

後初期命名為「被詛咒」的文學之意。只不過此一日治經驗的葛藤，是整個省籍作家在戰後仍持續面對的問題，筆者擬欲關心這一批省籍作家的書寫與精神史，以散文書寫的載體所乘載的書寫內涵等議題。

葉榮鐘與洪炎秋此一「見證者」的身分，透過對其書寫的細理，重新省思本土散文的美學詮釋框架問題，因為深究其中，臺灣現代散文多由中國現代美文與小品文的角度出發，日治影響傳統以降的散文全被排除在典律之外。由葉氏、洪氏的散文出發，可以發現這一路線的散文並非「質」勝「文」的特質，仍存有美學的意義，透過語言的張力與諧謔反諷筆法的使用；在蒐集每個人物「圖像」之中，透過敏銳的感思，發現、區別出廣闊思想內涵，可供發展的人事物，以作為雜文的材料，然後將其置於時代、社會歷史的更大時空下進行剖析與發掘，以一種非凡的穿透力，竭力排除其個別性具體性特殊性，快刀斬亂麻直截切入問題本質，做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整體概括。這些問題並非個人的，單一的，而是整個社會相、共相。這些筆法都逼視出本土散文並非沒有其美學意義，無疑地，本土散文的知性與理性的權衡中，對於歷史敘事、人的重新形塑，其實透視出的是一種更為可貴的、新的、詩學的姿態與方式，具有一種美學化、詩學化的面向。

本文的架構之所以由兩位作家的文學影響傳統開始談起，主要要回歸這樣的散文的根基於此？透過筆者的梳理與反省，可以發現葉榮鐘的雜文性質始終如往，而洪炎秋的小品文性質，由戰前的隱晦至戰後，與吳魯芹、梁實秋等小品文式的品味妝點風格迥異，將周作人隱晦的批判質疑力道加以發揚，這些書寫位移的實踐，當然有外力的驅動，但不可否認的是作家的把持。這當中必須連結至兩位作家「民間」經驗的植根，這便牽涉到藝術的根基與歸趨的討論，葉榮鐘與洪炎秋的散文雖趨向質樸，但此中亦有渾然無跡的藝術美學，例如生動的比喻、語言的活潑、多樣卻統一的結構經營等，趨近於日常的、生活式的語言，漫談不羈的展開，仍具結構形式的掌握。我們可以從中理解，葉榮鐘與洪炎秋的散文美學大多趨近於大幅展開的方式，其中夾帶微不足道之處，以小見大，形似大河小說的筆法，足以照鑑當中平凡卻高尚，平淡仁厚的情感層面。也可以說，作家所體現的美學在於告訴讀者：生活實踐與散文表現是互為表裡的。

夾殘在作家自我敘事下的斷裂和遺漏，實則是作家所隱藏與政權現實角力與對話的沉積物，他們對於「知識份子」位階的持守，無法捨棄對知識份子淑世理想的追尋，對現實的關注，所以他們將斑駁的認同、逝去的理想，潛藏於幽微的文心之中。雖口說三民主義、與政府諧和、閉口不語，牽涉出本土散文家在外部「文本」和美學關懷間的糾結拉距。但必須謹記著是，也正因為外部時空與內在書寫的牴觸、對話，葉榮鐘與洪炎秋的內在書寫核心，始終堅守與歷久彌新，那就是「人」的本位主義，以及「說自己的話」的本心。

此一世代的省籍作家，無論具有中國經驗、留日經驗、殖民經驗，跨越至戰後，相形在文學場域中消失，失去著力的空間。筆者透「本土散文」的命名，到實踐論述的過程，追究這群人對於「書寫權力」的堅持，面臨黨國體制下對於知識份子的價值抹殺、中國文化精髓的片面移植、戰前抗議傳統之下對於民主、自由的渴望。無疑地，他們的思想是主動的、對於知識的實踐，乃是繼承日治傳統剛強、批判、思辨，以及從知識和實踐出發的作品。

二、戰後省籍作家本土散文系譜、共有主題及詮釋框架

透過梳理洪炎秋「廢人」、葉榮鐘「半路出家者」的頹廢與無用的姿態，其中藏有著作家刻意經營的生存姿態，其生存姿態的背後透視著戰後大中國圖像的社會背影和歷史創傷，作家藉由這樣逆寫的生存姿態「突圍」被隱匿與消音的困境，理解此省籍作家經歷日治／日本／中國經驗交織的移動身體與身世經驗之間，作家不變的文學之心、作家之眼。故回歸本土散文論述，葉榮鐘與洪炎秋並非孤例，如何梳理乃至於建構戰後本省散文系譜，乃是下個階段該戮力與抵達的目標。

跨時代的省籍作家透過散文，對於日治葛藤的梳理，包括本論文曾旁及的林攀龍、施翠峰之外，尚有王詩琅、楊雲萍、黃得時、龍瑛宗、楊逵、巫永福、王昶雄、劉捷、葉笛、陳火泉等人，具備有不同的書寫位置所輻射出的書寫內涵、美學實踐、身世史等層面。諸如林攀龍對於法國文學的涵養，所生發出的幾近蒙田式的隨筆散文，平凡洗鍊的筆觸；而張深切與張我軍寫北平生活的庶民風貌，暗藏反殖民湧動的熱血；抑或者施翠峰極盡通俗的臺灣鄉土散文。可以說，本土散文系譜並非僅有雜文性質，更多省籍作家兼具有漢詩人的身份，葉榮鐘更多是跨身份的寫作，當中形構出的形式與美學技藝，並非是落空的一端。故，本文以葉榮鐘與洪炎秋兩個例子，回應戰前臺灣文學傳統存有問題散文與閒適小品文兩支散文路線，在戰後臺灣文學場域的延續狀況。

筆者認為透過此一散文史中，「本土散文」系譜的命名、建構、論述的過程，可以足一釐清作家在時代與自我藝術間交叉指涉的過程。筆者的嘗試絕非無意義，或者反省動作的終結。不僅暴露出臺灣文學史的書寫尚需不斷持續，且對於日治經驗傳統、民國史、流亡到臺灣的中國史的安置與理解，乃至於更多被屏除於「典律」美學詮釋框架之外的文類與文學「異聲」都應該持續以待，且更謙卑的執行。截至八〇年代本土化運動興起，「本土」被抬之高閣，但終究本源卻已經不被關注，葉榮鐘重構民族運動史被誤讀為「英雄」主義就是一例。必須重新回到作家的身世史、影響傳統進行考量，才會發現葉榮鐘等人戰後「半路出家」的書寫姿態，不光是語言書寫上的突圍，更是書寫心理的突圍，這樣的奮力一搏並不是為了取得「英雄」的光環，而是對於「理想」的記取與傳承。

重要的是，梳理、記取與反芻的過程「不是失誤的終結，而是對失誤真實本質的了解。」¹⁶對於日治歷史經驗與文學影響傳統的重新省思，對於傷痕的反省、理解與體貼，才是重要課題。

¹⁶ 費修珊（Shoshana Felman），〈第五章、天啓之後——寶羅德曼與陷入沉默〉，收錄於費修珊（Shoshana Felman）、勞瑞德（Dori Laub）著，劉裘蒂譯，《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臺北：麥田，1997），頁 233。